

富有才华，却出身寒素，偏见使他被人忽视，被人忘却；而他既吟赏山水，又慷慨咏怀，仍留下许多佳作，他就是——

## 湛方生

——一位与陶渊明气类相近的诗人

钱志熙

汉至西晋，处于边缘地位的寒庶阶层尚能以功名或文学争得社会地位，而且无论在文学上，还是在政治上，都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。这样的社会，自然还有一些张力，所以文学和思想都得以繁荣。但到了东晋，门阀士族真正是一枝独秀了，政治和社会地位登峰造极。寒素族即使在他们从来藉以跻身社会中上层的文章学艺方面，也有点儿溃不成军的样子，纵从事于文学而略得微名者，也仅仅是士族文学的附庸，难以表现出寒族文学自身的特点。那位在运租船中月夜高咏而有幸知遇于谢大将军的袁宏，其际遇甚至为李白所艳羨，可其结果也不过作了一位门阀士族的附庸文学家而已。倒是他那两首成名作《咏史诗》，呈现了一点寒素文学的气骨。这说明东晋的门阀，不仅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是垄断性的，就是在文学上也是垄断性的。典型地反映了门阀意识的玄言文学之所以独盛于东晋前中期文坛，其原因也可以想见了。

话太聒絮了，其实这番代古人发的牢骚，都是因为想起了那位寒素诗人湛方生。不专门治文学史的人，恐怕很少会知道他。这也难怪，因为他差不多就是一位无名氏诗人，关于他的记载，只有“为卫军谘议参军，有集十卷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这样一条。如果说他留下一二无关紧要的劣等作品也就算了。可是这位与谢混、殷仲文、陶渊明时代相近的诗人，并不是



一个平庸的作家。他的气类与陶渊明很接近,创作也很有个性。他的那十卷集子虽然已经散佚,但仍留下诗、赋、谣、咏、颂、赞、铭、杂文、骚辞等各体作品二十几篇<sup>①</sup>。了解魏晋文学的人一看就能知道,这一点作品在唐宋时代的话,只能算“少数作家”,但在魏晋、尤其是在文学歉收的东晋,这个数量就相当可观了。而其运用的体裁,差不多遍涉当时体裁种类的全部。东晋时代的文体学很不发达,远不如西晋之众体皆盛。方生能兼擅众体,并且每一体写得都不错,这在东晋文坛上并不多见。再从作品的艺术价值看,湛方生的这二十几篇作品所显示的语言技巧之娴熟和境界之清新,格调之高雅,在东晋文坛上也是不可多得的。东晋以文学扬名后世者,渊明之外,前有孙、许,后有殷、谢。方生这位几乎被时贤及后代人忘却的作家,其实际的文学成就和地位,至少可以与孙、许、殷、谢相侔。沈约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极力称颂殷谢的功绩,认为“仲文始革孙许之风,叔源大变太元之气”,但殷仲文只留下两首诗和两个佚句,谢混也只留下四首诗和两个佚句。谢的代表作《游西池诗》写景虽有佳句,但不如方生《帆入南湖》、《天晴》等诗的清隽自然。至于殷仲文的《南州桓公九井作》一诗,较可观玩的,也就“独有清秋日,能使高兴尽。景气多明远,风物自凄紧”两联而已,其余句子,仍不脱雕镂玄理之病。所以萧子显认为“仲文玄气,犹不尽除;谢混清新,得名未盛”(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),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。笔者无意于为古人较短论长,但从实际的成就来看,真正变革东晋贵族玄雅晦涩诗风的,当首推陶公,次推方生。钟嵘所说的“才秀人微,取淹当代”(《诗品·中》),评论鲍照果然贴切,移来形容方生的遭际,恐怕更可以说是如印印泥。三复钟氏此语,使人感叹不已。

方生究竟何许人也?他的《庐山神仙诗》序中记载,太元十一年(386)有人樵采庐山中,见一沙门“振裳挥锡,凌崖直上,排丹霄而轻举”。说明他太元十一年后尚在人间,而渊明此年二十二岁,因此

<sup>①</sup>见逯钦立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、严可均《全晋文》。又据孙启治、陈建华编《古佚书辑本目录·附考证》(中华书局1997年版),清周世教辑有《湛洛议集》一卷,现藏北图,所收《让中正笺》《火论》《盟社文》三文出严本之外。笔者曾到北图访求,借值锁馆装修,未获一见。

他或为渊明前辈，或为平辈；晚辈则不大可能，理由下面还要说到。他的《上贞女解》一文，是为贞女龙怜请求旌表的解状，文首记云：“伏见西道县治下里龙怜。”曹道衡、沈玉成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》“湛方生”条，根据《上贞女解》推断方生“或曾官越州西道县”。按越州应作交州。检《南齐书·州郡志》及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四册齐、梁、陈各图，知西道县属交州新昌郡，在今越南郡内。越州则在雷州半岛一带。但上列地图集中的东晋各图，交州（东晋交州包括越州一带）并无西道县建置，大概西道县是南齐时才设立的。所以湛方生所说的西道县，不大可能是交州西道县。那么湛方生曾经在那里做过官的西道县又在那里呢？笔者于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中得到了这样一条记载：

江水又东历前门虎牙之门（酈注略）。又东南过夷道县北，夷水从佷山县南，东北注之。（以下酈注）夷道县，汉武帝伐西南夷，路由此出，故曰夷道矣。王莽更名江南，桓温父名彝，改曰西道。（卷34“江水二”）

可知夷道县（今湖北宜都），在桓温时曾改为西道县。方生文章中的西道县，就是荆州夷道县。桓温于永和初（元年为346年）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<sup>①</sup>。桓温改夷道为西道，应该是在他担任荆州刺史之后。《湖北宜都地名志》记载：“晋太和中，荆州刺史桓温以父（桓夷）嫌名，改夷道为西道，后复名。”太和是东晋废帝年号，从366年到370年。至于西道县何时又重新改回为夷道县，自然也跟桓家兴废有关，我想最迟也只能在元兴三年（404），这一年桓玄篡位彻底失败。桓氏沦为叛逆，西道县自然非改回为夷道县不可。根据以上情况可知，西道县名使用的时间，当为366年至404年之间。方生在西道县做官，也只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。由此也可大略推测他的生活年代。所以上文中我们说他只能是陶渊

<sup>①</sup>《晋书·桓温传》：“（庾）翼卒，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”又据同书《庾翼传》，翼卒于永和元年。

明的先辈或平辈,不太可能是他的晚辈。根据各种材料所提供的一种模糊信息,我觉得方生最有可能是陶渊明的先辈。

宜都为山水名区,方生在宜都时所作,至少有《上贞女解》、《修学校教》、《游园咏》三篇。《上贞女解》记载贞女龙怜的事迹。她出嫁半年,丈夫就去世了。不久丈夫的三个兄弟也“相寻凋落”。龙怜没有离开夫家,而是变卖父母之资、躬亲机杼之事,操办夫家的接二连三的丧事并守着香火五十年,中间拒绝了不少人的聘娶。方生认为古来节妇,“或毁发肤之体,以绝求者之望,或自经沟中,苟全不夺之志。虽操存而身亡,行立而形亏”,为了守节而毁身灭性。像龙怜这样身命与节行兼全的,尤为难得。他说:“怜盖草莱之妇人耳,生于幽谷之中,长于荒榛之下,目不见尺素之文,耳不闻古今之说,师心率己,蹈兹四德,抑可谓稟山岳自然天知者矣。”认为她是山水灵秀之所钟毓,道德发于自然,无关于名教的淬厉,这是很有玄学意味的一种看法。《修学校教》应是代上司所作的教令,文略云:

贵郡之境,山秀水清。岭举云霞之标,泽流清旷之气,荆蓝之璞,岂不在兹。(下佚)

在官方的文告中,有这样品题山水的妙语,可以想见东晋人为官之风致。又说到“荆蓝之璞”,当属宜都无疑。

《游园咏》,体裁介于诗赋之间,是一篇辞体短歌,方生于五言诗之外,亦擅长此体。这篇山水杂咏对于了解方生在宜都的山水之游,以及他的思想趣向,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其中提到的几个小地名,更可进一步证实方生的仕宦地确实在宜都一带。咏曰:

凉兹境之可怀,究川阜之奇势。水穷清以彻鉴,山邻天而无际。乘初霁之新景,登北馆以悠瞩。对荆门之孤阜,旁渔阳之秀岳。乘夕阳而含咏,杖轻策以行游。袭秋兰之流芳,幙长猗之森修。任缓步以升降,历丘墟而四周。智无涯而难恬,性有方而易适。差一毫而遽乖,徒理存而事隔,故羈马思其华林,笼雉想其皋泽。矧流客之归思,岂可忘于畴昔。

宜都以山水形胜著名，方生在一个雨霁天清的日子，登上北馆，遥望荆门，旁瞻渔阳秀峰。荆门即荆门山，在宜都西北的长江南，跨宜都、宜昌两县之间，与虎牙山隔江相对。渔阳当是渔阳河，又名汉阳河（参见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中“方輿全图总说”卷2，及《湖北宜都县地名志》）。河两岸多峻峰，即方生所说的渔阳之秀岳。唯有北馆这个地名不见于有关载籍。疑即《水经注》中所说的“望堂”：

郡治在(宜都)县东四百步，故城吴丞相陆逊所筑也。为二江之会也，北有湖里渊，渊上橘柚蔽野，桑麻暗日，西望很山诸岭，重峰叠秀，青翠相临，时有丹霞白云，游曳其上。城东北有望堂，地特峻，下临青江，游瞩之名处也。（卷34“江水二”）

清杨守敬（宜都人）《水经注疏》卷三十四记载，望堂“在今宜都县西”，可见古今宜都县治略有变动。方生咏中所描写的景观，与《水经注》所叙很相近，所以北馆当即望堂，因为建于城北峻峰之上，所以称北馆。据此文，可知方生游宦之地为宜都无疑。咏的结尾，写宦游虽乐，终不如回到故乡，过一种抱朴守素的隐居生活，与他的《怀归谣》意旨相同。

宦游宜都，文章得江山之助，使方生成为山水诗史上的先驱诗人。从所存的作品可以看到，他的山水审美意识已十分自觉，鉴赏山水的眼界也很高，加之娴熟的描写技巧，可以推测他在宜都应该还有一些山水作品。现存的三首重要的山水诗，则应是从宜都还都城或家乡时的江行之咏。《帆入南湖》：

彭蠡纪三江，庐岳主众阜。白沙净川路，青松蔚岩首。此水何时流？此山何时？人运互推迁，兹器独长久。悠悠宇宙中，古今迭先后。

彭蠡湖为三江之汇，庐山为众峰之首。诗人自上游千里放舟而来，至此将近南湖之时，见景物格外明净可喜，江岸白沙，岩巔松色，相映而丽，面对悠悠无尽的江水，不禁生出宇宙无穷、人生有限的感慨。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玄理，而是很深沉的宇宙意识。唐人

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以其宇宙意识为人所称道，数百年前的湛方生实已开其先声。“白沙”一联，写景简而得神，确是东晋人笔法。《还都帆》：

高岳万丈峻，长湖千里清。白沙穷年洁，林松冬夏青。水无暂停留，木有千载贞。寤言赋新诗，忽忘羁客情。

此诗境界意理与上诗相近，很有可能是同时所作。首二句高远而阔大，次二句以写为叙，句法峭然有致。“水无”一句，似是暗用《论语》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”。看江水滚滚而去，联想起人生时光之流逝。所以接下去一句说“木有千载贞”，亦即人无百年，木有千岁的意思。最后写自己观览山水，超然有悟，忽忘千里羁愁。《天晴诗》：

屏翳寝神辔，飞廉收灵扇。青天莹如镜，凝津平如研。落帆修江渚，悠悠极长眇。清气朗山壑，千里遥相见。

江行三诗中，此篇尤其精彩。风雨过后，江上青天如镜，平津似研，上无一丝云翳，下无半重浪痕。天晴雨霁，江面风浪不生，落下船帆，船走得慢了，更觉得江岸沙渚之修远；悠悠远眺，但觉清气朗映山壑，如可见千里之遥；江山明净，纤毫无染。此诗写景浑成，而复觉神超形拔，可称妙鉴山水。其修洁省净，似非谢客所及，倒是接近渊明风格，但渊明集中，亦无专咏江山景物之作。江行之作，后世甚多，方生此篇，堪称首创。

方生不仅长于吟赏山水，作为一位寒素诗人，更有慷慨咏怀的作品。他的《秋夜诗》和《怀春赋》都是览物兴悲之作，有感于生命短暂。这在魏晋是常见的，但东晋玄学独盛，虚淡者多，慷慨者少，所以他的这种作品，不能不说是文学中抒情之风重兴的先兆。何况诗人笔底确有一种寒士失职的不平之气：

悲九秋之为节，物凋悴而无荣。岭颓鲜而殒绿，木倾柯而落英。履代谢以惆怅，睹摇落而兴情……

明显可见宋玉《九辨》之影响。诗中写秋夜之感云：

秋夜清兮！何秋夕之转长，夜悠悠而难极，月皦皦而停光。  
播商气以清温，扇高风以革凉；水激波以成涟，露凝结而为霜。  
凡有生而必凋，情何感而不伤？

形容秋夜景象比较细致，情绪也很摇荡感伤。但最后还是以老庄玄理陶写，“拂尘襟于玄风，散近滞于老庄，揽逍遥之宏维，总齐物之大纲，同天地于一指，等太山于毫芒。万虑一时顿澡，情累豁焉都忘”。虽为发抒玄思，然亦句句清壮。

和陶渊明一样，湛方生在仕途上似乎也很不惬意，宦情冷落，常有归欤之叹。《游园咏》已经表现了这一点，将自己比作思华林之羁马、想皋泽之笼雉。《怀归谣》则专写岁暮怀归之思，相当于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只是渊明是归后所作，方生作此谣仍在客乡，所以情绪十分凄苦：

辞衡门兮至欢，怀生离兮苦辛。岂羁旅兮一慨，亦代谢兮感人。  
四运兮道尽，化新兮岁故。气惨惨兮凝晨，风悽悽兮薄暮。  
雨雪兮交纷，重云兮四布。天地兮一色，六合兮同素，山木兮摧披，  
津壑兮凝互。感羁旅兮苦心，怀桑梓兮增慕。胡马兮恋北，越鸟兮依阳。  
彼禽兽兮尚然，况君子兮去故乡。望归途兮漫漫，吟江流兮洋洋。  
思涉路兮无由，欲越津兮无梁。

从作品意境来看，大概也是在宜都仕宦时所作的。方生的生活态度是抱朴适性，《游园咏》中“智无涯而难恬，性有方而易适”就表达了他对机诈虚伪的官场的厌弃，和对适性抱朴生活的向往。作为一介寒士，方生的适性与陶渊明一样，是指隐居衡门、与至亲朝夕相聚的生活，所以他最后终于放弃仕宦，归隐乡园。《后斋诗》即是写这种隐居生活，所表现的情调很像渊明的田园诗。诗云：

解纆复褐，辞朝归蓺。门不容轩，宅不容亩。茂草笼庭，滋兰拂牖。  
抚我子侄，携我亲友。茹彼园蔬，饮此春酒。开椀攸曷，

坐对川阜。心焉孰託，託心非有。素构易抱，玄根难朽。即之匪远，可以长久。

从“开根攸矚”两句可以知道，方生的家乡也是山水风景很优美的地方，无怪乎诗人如此念念思归。但他的家业似乎比陶渊明还要贫薄，渊明尚有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”，他却是“门不容轩，宅不盈亩”。因此隐居之后，诗人也要像渊明一样躬耕自资，《庭前植稻苗赞》透露了这一情况：

蓊蓊嘉苗，离离阶侧。弱叶繁蔚，圆株疏植。流津沃根，轻露濯色。

文字虽然不及陶渊明那样自然生动，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方生对于农耕的喜悦自足之情。其中“流津沃根，轻露濯色”，让我们想起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”，“有风自南，翼彼新苗”这些陶诗名句。

方生在思想上服膺老子，这原是当时的风尚，但他对老子的领会，着重于弃智抱朴、守素以自适，则反映了他的寒素本色。《与诸人共讲老子诗》、《老子赞》、《北叟赞》这几篇作品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观。这些作品都强调了老子思想对于诗人迷惘人生的开悟作用：

吾生幸凝湛，智浪纷竞结。流宕失真宗，遂之弱丧辙。虽欲反故乡，埋翳归途绝。涤除非玄风，垢心焉能歇。大矣五千鸣，特为道丧设。鉴之诚水镜，尘秽皆朗彻。

——《诸人共讲老子诗》

诗人将一种思想的归宿称之为“故乡”，念念不忘地追求，这与他在宦途中惓惓思归的情绪是一致的。在这里可看出他弃官归隐的思想根源。

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，方生的作品，在东晋时期堪称上乘。他虽然受到玄风的影响，但仍然表现寒士文学悒悒抒情的特点。在艺术上，他吸取东晋文学高简隽雅的特点，而更加向自然朴素、写物传神的方向发展。他在晋末刘宋的实际影响如何我们不得而知，



但至少从文学史发展的逻辑上看,他对晋末宋初的文学是有开风气作用的。他与陶渊明在思想乃至作品主题上的多方面相似,似乎也不是偶然的巧合。陶渊明在创作上是否受到方生的启示,在找不到具体的材料情况下我们不好遽尔推论。但从方生的出现,可以证明陶渊明出现于晋末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,并非孤立的、无法解释的现象。同时方生的出现,更证明了寒素士人在文学创作上不可抑制的创造力,即使在东晋这样一个时代。

方生是一位连钟嵘也将他完全忘却或忽略掉了的诗人。这个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,对于研究文学史来说,当时代人的评价固然重要,但这种“当代批评”是有局限性的。钟嵘《诗品》,无疑是中古诗歌研究方面的经典,但受这种“当代批评局限性”的限制,并没有最准确地反映出中古诗坛及其发展的全貌。忘掉湛方生,比起低评陶渊明来,更能反映根深蒂固的士族文学观念的偏见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)

扬州八怪,一反正统画风,被人目为“偏师”、“怪物”,旷达的袁枚与他们却有着或疏或密的交往……

## 结交扬州八怪

——袁枚纪事之四



王英志

袁枚辞官后,曾与扬州八怪画派中的几位重要人物有过或密或疏的交往。

**1**

袁枚居南京随园不久,就结识了沈补萝、李晴江,关系极洽,被士林目为“三君”的李晴江就是扬州八怪中人。